

8

革命回忆录

东方军的英勇战斗
和经验教训

李志民

朱德同志在长征中同张
国焘斗争的片断史实

吴传宝

罗荣桓同志在山东领导
对旧军队的改造工作

王振乾

内蒙古革命的发生、
发展简况

佛鼎

怀念柯棣

郭庆兰

人民出版社

革命回忆录

(八)

人民出版社

革命回忆录

(八)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37,000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6,000

书号 11001·540 定价 0.49元

K260.6
2.8

236546

《革命回忆录》丛书编辑例言

为了收集、积累、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分册陆续出版。

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仅供参考。

《革命回忆录》上刊载的文章，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但因一个人的革命实践有限，或因记忆有误，难免有不详尽之处。如有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欢迎提出订正、补充。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经验教训	李志民(1)
朱德同志在长征中同张国焘斗争的片断史实	吴传宝(33)
参加讨袁护国之役的刘伯承同志	马宣伟(42)
贺龙同志入党前的几件事	许和钧(51)
罗荣桓同志在山东领导对旧军队的改造工作	王振乾(58)
杰出的革命实践家韦拔群同志	黄松坚 黄 荣(78)
张云逸同志二三事	覃国翰(110)
内蒙古革命的发生、发展简况	佛 鼎(116)
大革命时期绥远地区的革命斗争	刘进仁(149)
怀念柯棣	郭庆兰(180)
重返皖南	杨 明(191)

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经验教训*

李志民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过去，人们往往以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其实“左”和右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过很大危害与损失。尤其是“左”倾冒险主义，拉起革命的大旗，喊着革命的口号，带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因而对全党的统治时间更长，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更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东方军的经验教训就是有力的证明。

东方军的组成及其历史背景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我们红一方面军在总前委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连续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

* 这是李志民同志写的长篇回忆录中的一篇，全部回忆录写成后，将由人民出版社出书。本篇题目是我们加的。——编者

剿”的伟大胜利。一九三一年底，红军又英勇出击，攻克了许多城镇，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弹药来补充、壮大自己，巩固、扩大了中央苏区。通过三次反“围剿”作战，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军（包括各个地区的红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名著中所指出，规定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十六字诀是一九二八年提出的；“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①

但是，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并未重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们不了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无视敌强我弱、革命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的客观现实，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主观地认为当时苏区已经巩固，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从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关于“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开灭战”等正确的作战原则，提出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②在这种“速胜论”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六月五日的军事训令，作出了《关于争取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卷，第一八八页。

②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的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并要求闽西苏区“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由于决议通过后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未能入闽去争取江西“东方一翼”的胜利，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组成“东方军”入闽。

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同，毛泽东同志根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的新形势，积极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通过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的卖国阴谋，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同时，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仅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而错误地给他加上“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游击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等大帽子，不断排挤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他们借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让他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撤销他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十二月在选举他为中央苏维埃主席的同时，免除了他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只安排他为中革军委十五名委员中的第十二名委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免去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亲任“剿共总司令”，出动了五六十万兵力，对我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开始时，敌人对我

中央苏区采取守势，首先围攻鄂豫皖、洪湖两根据地，以解除我红军对武汉的威胁。接着，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又亲自到南昌督战，集中兵力分三路进犯中央苏区。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已离开了红军，但由于作为全党军事经验总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早已深入人心，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红军中还不占主导地位，在直接参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的创造者的周恩来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正确指挥下，每次战斗仍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所以连战皆捷，至三月二十一日就歼灭国民党“进剿”军三个师大部，活捉李明、陈时骥两个师长，歼敌二万八千人，缴枪万余，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战斗中发展到十万人之众。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充分肯定了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正确和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第四次“围剿”中的惨败。为此，蒋介石曾手谕陈诚，沮丧地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其狼狈程度可想而知。

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白区难以立足，被迫撤到了中央苏区。五月十二日，中革军委加委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军在前方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达八个月之久，指挥全国红军，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直接地在苏区和红军中得以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

了头脑，尽管每个胜利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坚决抵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挥的情况下取得的，但这些阿Q却盲目地鼓吹这次胜利是执行他们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的结果，从而更助长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左”倾冒险主义在红军中泛滥成灾。王明、博古和项英等人本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特别是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又丝毫不吸收粉碎一、二、三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实际经验，不调查研究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具体情况，盲目地主观地提出许多“左”的口号，确定了许多不能实现的紧急任务：什么“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打正规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等，生硬照搬苏联的一套。博古等人还竭力依靠、抬高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①，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博古、项英更是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使他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从而实际上剥夺了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军事指挥权。

他们提出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就是把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两个主力部队分开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本来从一九三〇年以来，一、三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并肩作战，拧成一股绳，所向披靡，形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拳头砸向敌人。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决策下，两个主力部队被分割，打击敌人的力量被分散。一九

^① 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

三三年夏，他们害怕根据地的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以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于江西的宜黄、乐安、南丰一线，正面牵制崇仁、金溪之敌，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使它失去机动灵活歼敌的机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又一度以一军团为主改组为“西方军”，节节阻击“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同样失去机动作战的机会）。同时，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三军团（暂缺红六师）为主，包括福建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滕代远同志为政委。为配合作战，还命令红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部分分区的地方武装亦统归彭、滕就近指挥。东方军组成后，七月二日三军团即率红四、五师由江西广昌的头陂地区出发，分两路经新安、丹溪和驿前、石城向福建进军，于七月五日到达宁化以西地区集结，去执行收复闽西沦陷的连城、新泉苏区和开辟闽北新苏区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当时因为没有一军团的协同配合，东方军虽然奋力苦战，但孤军奋斗，搞得疲劳不堪，未能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永垂青史

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红一方面军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的正确领导下，在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滕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因病调离后，杨接任政委）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然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

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了红军，筹集了大量物资，部分地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穿衣、吃盐等等困难。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东方军向福建进军之后，几乎每战都是经过周、朱、彭、滕（杨）诸同志与“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在往返电报中反复争论，甚至激烈斗争才取胜的。入闽第一仗是拔除宁化县的泉上土堡。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地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之处，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个土堡墙高约二丈五尺，厚二丈余，相当坚固。驻有国民党军阀卢兴邦师第三〇七团，并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四百多人。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极大障碍，所以东方军决定首先拔掉这个钉子。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当时心目中只有中心城市，即使一时打不了大城市也要打县城，完全不把小小的泉上土堡放在眼中。所以，他们不顾实际情况，下令东方军首先攻打清流县城。

当时的争论，给东方军作战造成极大困难。七月四日，彭、滕电请第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中革军委项英代主席，提出：“清流、泉上、嵩口仍为卢逆，共四团无变化。首先消灭泉上之敌，后再同时攻击嵩口、清流之敌。此举我有集结主力随时打击增援敌之便。”同时说明，清流城堡坚固，敌人利用天险加修工事，袭击万一不克，要延误时间，再从

火线撤下打增援之敌，将影响士气。这些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的战斗部署，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术原则，很快取得周、朱同意。七月五日，周、朱回电指出：“如敌情无变化，三军团应首袭泉上，占领后迅速取得归化，以一部断嵩口通永安联络，相机截击永安或连城来援之敌。”但是，七月六日项英回电，却极端主观地认为：“对东方军目前的行动，如就来电所云，事实上仅能消灭泉上、归化之敌，即转移北上，绝无可能打击连城援敌。”“泉上、归化均属城围，工事虽较清流易攻坚，则我意仍以清流为攻击目标，坚决消灭三团人，连城敌有增援可能，若消灭援敌对东南、西南战线有大影响。”

正当周、朱、彭、滕与项英争论之际，七月九日，卢兴邦部的旅长张兴隆率第三〇九团从清流增援泉上。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根据原定“围点打援”的战术原则，除令红五师主力继续包围泉上，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红四师在离泉上三十余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

泉上通延祥的小道上，两旁均为高山峻岭，中间是一狭长洼地，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这一天，敌三〇九团刚进入伏击圈，红四师张锡龙师长、彭雪枫政委立即发出攻击命令。红军战士先是从两侧山上居高临下以火力杀伤敌人，然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只一小时激战，就干净利落地全歼敌人这个团，无一漏网。接着，红四师乘胜追击，进占清流东北的嵩溪；独立红七师进占清流西北岭下、田背一线；红三十四师进占清流西南的雾阁地区，从而切断了清流与泉上的联系，进一步孤立泉上敌人。同时，红五师第十三团也

乘胜东进，歼灭归化守敌一个营，解放了归化城。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证明“围点打援”战术的正确。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急于要进攻清流和连城守敌，七月十日又电令东方军“只留一团围攻泉上，并由该团抽出一连为基干，领导归化东北游击队，巩固归化”，同时命令主力部队大部分立刻转移到清流南面，准备消灭清流撤退之敌，或配合三十四师打击连城增援清流之敌。

在此情况下，七月十一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不得不给项英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指出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打击敌人增援部队，不能采取积极进攻清流城的办法。并指出以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及令红十九师渡将乐河南下都是不妥当的，因目前多雨，山水时涨，闽省各河流急水深，大兵团运动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多病员，请项英“决定部队行动稍稍顾及此点”。同时，在另一封电报中转达了彭、滕的意见，力言即刻移兵清流南岸，“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因泉上敌之兵力超过八连人。我主力南移，连（城）敌如不动，清流敌可北向，解泉上围，我成隔岸观火，迂回过河须三天行程，现三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并明确表示已复电令彭、滕依预定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胜利。要求项英：“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次日，彭、滕又将围攻泉上、清流、连城的意见电告项英，强调指出：“泉上土围敌八个步兵连，机、炮各一连，地主武装百余人^①，

^① 后查明有四百余人。

一团围一团是不够的。况反动童子军、大刀会在外面扰乱，因此再无力顾及归化。”在周、朱、彭、滕据理力争下，项英等人才缓和口气，回电周、朱并转彭、滕解释说：“我迭电你们不是命令，而是提出某一阶段中作战意图……。”但仍软中带硬，固执地坚持己见。

七月十四日，在东方军围攻泉上土堡，并接连取得延祥、归化战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红三十四师在清流与连城之间的安乐、雾阁一带也积极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切断清流、连城之间的联系。盘踞清流的卢兴邦主力三个团慑于我军的威力，弃城向永安撤退，红三十四师经安乐向秋口截击未获，于雾阁与马屋附近击溃从连城增援清流的敌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个团，乘胜占领了上堡。红四师第十团、十一团和独立七师乘胜进占了清流域；红四师第十二团亦向嵩口坪、秋口推进，牵制连城守敌。

此时，敌七十八师还有两个团在雾阁附近的四堡。项英获知这一情况，并得悉连城敌人还可能派出三、四个团增援四堡的情报，没有通盘考虑整个战局，七月十六日便匆忙以“十万火急”电令东方军放弃泉上，立即南下配合三十四师歼灭四堡敌人这两个团，并准备歼灭连城援敌三、四个团，同时严令“部署中应注意不使该两团撤回连城固守，而成相持之势。”

周恩来总政委接到项英这“十万火急”的电令后实在感到为难，马上复电提出意见：“泉敌不应放走，围攻至少要两团（两团无外围敌有突围可能），立刻以四团兵力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四堡有工事），打增援队则火力不足。”“调十九师接

围泉上，以三军团全部南移则须延迟三天，泉上到四堡三天又恐四堡之敌情有变化。”但周总政委在提出意见的同时，为了执行军委项英的“十万火急”电令，还是尽最大努力，命令在将乐县白莲地区的红十九师迅即南下，两天以后赶到泉上去接替三军团围攻泉上的任务，以便三军团腾出手来，集中兵力全部南下，同时，命令三军团除留足兵力继续围攻泉上，等待十九师来接围外，其余主力部队立即集中清流，经安乐、雾阁之西，秘密运动，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事实证明，不待我三军团南下，四堡两团敌人早已撤回连城，项英的“十万火急”电令，只是主观臆想而已。

七月十九日拂晓，围攻泉上土堡的红五师第十五团完成了坑道作业，把土硝装在棺材内，推进坑道炸开土堡围墙，趁硝烟弥漫之际，勇猛冲入堡内，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干净利落地全部歼灭守敌一个团。至此，延祥和泉上两战共毙敌四百余人，其中团长一人；俘敌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旅、团长各一人，营长三人。缴获步枪一千一百余支，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驳壳枪六十支。此外俘虏宁化新旧县长二人，宁化、清流、归化等县逃亡地主恶霸及地主武装三百余人，缴获大批现款、粮食、食盐等物资。

东方军首战告捷，拔除了泉上土堡，解放了清流、归化两县大片土地，军威大振。为了总结入闽以来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总政委于七月二十日特地就“关于打泉上战略部署的争论问题”致项英一封电报，批评项英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和可能，连日频频来电，喋喋不休地催促部队攻打清流及南下

打连城。并严肃指出：“我们争论并非意图不同，更非不认识主要突击方向或总攻下泉上即应北上与东向”，“我们不同，乃在我们判断连（城）敌援不是如你所料，不主张三军团主力立刻过清流河及南下……而你主张分兵南下，这是战略实施在战术上的问题，须估计到当时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等，我坚持执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周恩来同志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主观主义的指挥方式是个有力的批评。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正确和英明，足以说明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东方军军事上的胜利，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盲目要求扩大战果。他们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就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把古田会议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缩小成只有打仗一项。所以解放这些地方后，不待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新区，便匆忙命令部队去进攻连城，限时刻到达，并指定必须由北向南进攻。他们坐在江西瑞金，不了解福建连城的实际情况，不接受攻打泉上作战部署争论的教训，仍在那里瞎指挥。

连城、新泉原为我闽西苏区，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被十九路军侵占。所以，当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土堡时，红三十四师